

国际政治新知文丛

王逸舟 主编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美国的能源安全 研究及启示

戚凯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国际政治新知文丛

王逸舟 主编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美国的能源安全 研究及启示

戚凯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及启示 / 戚凯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9
(国际政治新知文丛 / 王逸舟主编)

ISBN 978-7-5699-1108-4

I. ①美… II. ①戚… III. ①能源—国家安全—研究—美国 IV. ①T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6715 号

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及启示

著 者 | 戚 凯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杨迎会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许日春

责任校对 | 吴金凤

装帧设计 | 孙丽莉 王艾迪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0317-519686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24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108-4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 0.1 问题与意义 / 1
- 0.2 研究内容：概念与议题 / 8
- 0.3 相关研究情况 / 22
- 0.4 创新及其方法 / 35

第1章 能源问题与美国的崛起

- 1.1 能源何以成为问题：民族国家、科技进步与社会结构 / 42
- 1.2 美国的发展与能源问题 / 54

第2章 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美国能源安全研究

- 2.1 二战与冷战：战争威胁与研究的先声 / 73
- 2.2 1973年石油危机：“危机反应”与研究的勃兴 / 91

2.3 混乱世界与纷繁时局：研究的繁荣与争论 / 110

2.4 环境灾难、冷战终结与全球化：多元研究时代的开启 / 135

第3章 美国能源安全研究的内在演进

3.1 美国能源安全研究的主导思想 / 157

3.2 考察视角：以地缘政治学的分析为例 / 165

3.3 研究方法：以经济学思想的引入为例 / 173

第4章 理论分析：知识学视角的解读

4.1 知识学理论的回顾 / 182

4.2 知识学理论的解读：以“研究纲领”为例 / 193

4.3 知识计量学的分析：以JSTOR期刊库为样本 / 206

结语 对中国的启示

5.1 美国能源安全研究发展的原因 / 219

5.2 美国能源安全研究：对中国的现实关照 / 221

5.3 能源安全研究：历史考察及其意义 / 227

参考文献 / 232

附 录 / 272

后 记 / 276

绪 论

0.1 问题与意义

自1993年开始，中国具有历史突破性地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自那以后，中国的能源进口出现了急剧增长。仅进入新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就从2.2亿吨增长至4.7亿吨，天然气消费从245亿立方米增长至1294亿立方米；^①除去能源需求总量上升以外，能源对外依赖度也继续上升，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石油2011年对外依存度高达56.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21.9%。2012年10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指出，近年来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特别是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到2030年，中国多达80%的石油和多达50%的天然气将通过马六甲海峡从海上进口。^②可以说，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面临的能源保障困境与能源安全问题会越发严峻。因此能源安全与保障问题已

①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011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2年1月，第399页。

② Alan Dupont, “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National Interests*, May & June, 2012.

经成为学界和中国政府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自身研究视野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当中并没有能源安全研究的一席之地。^①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形势的进一步紧张，能源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领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由此能源安全问题研究在中国也日渐成为一门“显学”。然而，中国的能源安全研究在学理层面的真正意义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几乎没有什么学者专注于探讨中国二十余年能源安全研究的历史、进程、背后的动能以及可能蕴含的理论意义。因此，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类似研究更为发达的国家与地区，首先我们想到的便是美国，美国能源安全研究水平的高质量可能会对中国的类似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启发。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其综合国力长期居于世界首位，是一个对世界政治、经济具有极大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超级大国。作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与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规模和能源需求相似，美国出于经济发展与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对于能源也有着关键性的需求。在能源安全、保障与相关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着诸多类似的地方。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庞大的国内消费人群，同时本国也拥有较丰富的能源储藏，但二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于能源消费的需求极为旺盛，从国际市场获取能源是其重要的能源保障渠道。因此二者也都面临着类似的能源安全威胁，其主要表现为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以及国际政治中存在诸多威胁本国能源稳定供

① “能源安全”与“能源安全研究”的学术界定见后文。

应的潜在和不确定因素。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美国能源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将对提升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如何在整个国家层面全局性地协调或解决能源问题，是一门专业知识（Specialty），也就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的研究对象——“能源安全研究”（Energy Security Studies）。作为一项专业性的研究工作，能源安全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能源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它隶属于国际关系研究（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①

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许多学者相信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国别属性，而且当前世界中，国际关系研究的最重镇在美国；那么，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是不是也是全球领先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一系列的历史事实均可以证明这一判断：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即奉总统命令，成立了总统资源委员会（President's Materials Policy Commission），调集来自工业界、大学与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展有关资源与国家安全、对外关系之间关系的研究。

① 詹姆斯·麦克兰德（Charles A. McClelland）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L. Pfaltzgraff, Jr.）认为“国际关系”是“针对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次国家实体（譬如官僚阶层、政治党派、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与政治科学、地理学、历史、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有联系”。詹姆斯·多尔蒂（James E. 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地为“国际关系”标明定义，但是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更清晰地了解“世界背景下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之间‘砂砾化’的关系（Shifting-Sand Relationships）”。参阅：Encyclopedia Britannica, s.v.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cessed May 1, 2014,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91237/international-relations/>; James E Dougherty, Robert L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Philadelphia: J.B. Lippincott, 1971), 1.

· 1959年,美国石油研究院(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ion)联合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能源保障问题的学术会议。

· 经过长期发展,目前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专业人员的规模与质量雄居世界首位,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数据显示,全球6826家智库中,美国以1828家排名第一,^①远超各国;^②其中按照研究领域进行划分,全球前20名专攻研究能源与资源事务研究的智库中,美国占了6家。^{③④}

· 来自全球美、英、中知名大学或智库的能源安全研究学者在接受笔者采访或公开学术场合均认可美国在全球能源安全研究领域的顶级地位。^⑤

诸如此类的众多事实、观点与数据都说明,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强大

① 2013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Philadelphia: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anuary 22, 2014), 19, accessed March 23, 2014, <http://gotothinktank.com/dev1/wp-content/uploads/2014/01/GoToReport2013.pdf>.

② 排名第二的中国仅有426家,前十名中,除美国外,其余九国的智库总数为1815家,仍少于美国一家。See, 2013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21.

③ 2013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57.

④ 还需要指出的是,报告中许多名列前茅的美国智库,因为其综合性的特征,故而未列入专门性的智库排名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综合性智库并不开展高质量的能源安全研究;譬如此次排名中名列全球第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就设有专门的“气候与能源经济”(Climate and Energy Economics Project)与“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 Initiative)两个研究项目。这意味着单就智库而言,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工作的质量之高、规模之大,实际上要更加优于这份报告的评估结论。

⑤ 许勤华,笔者访谈,北京,2012年2月27日;曾兴球,笔者访谈,北京,2013年3月27日;王逸舟,笔者访谈,北京,2013年4月8日;Carl Luft, interviewed by author, Beijing, June 13, 2013;石泽,笔者访谈,北京,2013年7月8日;Andrew Mertha, interviewed by author, Ithaca, NY, November 7, 2013;Edward Cunningham, interviewed by author, Cambridge, MA, December 30, 2013;Connie Yuan, interviewed by author, Ithaca, NY, April 8, 2014.

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总量与能源消耗量巨大的国家，能源安全研究对于美国的霸权护持意义重大。

学术研究从来不能只停留在表象之上，我们的学术兴趣不应该只停留在有关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的一个简单判断之上，透过当前的景象，我们不禁会产生若干学理性质的疑问：能源安全研究在美国是如何得以萌发的？萌发之后又经历了什么样的重大转折与变化？在流变成长的过程中，它是否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国特色？在这漫长的历史之中，它发展背后的历史背景又是如何？它是否又存在内在的演进？在性质上，它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力争保持中立的研究，还是体现了典型的为公权部门服务的特质？

解答这些问题，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实质上也为本研究指出了一个潜在的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方向，它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能源安全研究这一重要议题的学术研究为研究对象，它并不是针对任何具体能源问题的研究，譬如中美能源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美国页岩气的开发前景及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兴衰并不在此研究观察视域之内。

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在历史层面对一项专门性的学术活动的发展史予以回顾（Review）、阐释（Interpretation）与理解（Understanding），以期清晰地梳理能源安全研究在美国的肇始、发展与流变，并尽可能发掘这一学术史动态过程背后的动力、机制，特别是“情境、人物与事件三者之间的独特结合”。^①

本书所做的研究是一项典型的基础性工作，其目的在于依托历史事

^①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实的发掘，梳理清楚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工作在以往数十年里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以及对这些历史进行尽可能贴近事实的阐释。尽管从表面看起来它对当下的具体能源问题的政策研究并无快速性的襄助作用，但是对这段学术史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对于能源安全研究的知识源起、传承与流变增加更多的认知，也有助于发现其中未被前人发现或者未受重视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深厚的基础以及启动新研究的“抓手”——剖析这段历史所付出的努力将使得本领域的研究能力和视野进一步扩展与深化，最终对未来的研究实现映射。

就公共事务而言，对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历史的梳理与知识性解读，既具有学术层面的增量意义，又具有现实层面国家发展意义上的引导功能。新世纪以来，“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政界、学术界、传媒界乃至民间的热门议题，能源安全研究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一门“显学”；然而，对于这项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却并无多少人进行过真正的追问。任何一项研究，都需要对自身所属的学科或项目回答两个最基本的“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式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处来？”^①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重大议题之一，能源安全研究本质上是一类学术知识，从纯粹的学术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具有天然的普世性，它无疑是要继承前辈先贤们的研究成就的，在现实中也就是美国的学者们利用几十年时间所走过的学术发展印迹。我们很难想象，

^① 乔斯坦·贾德是挪威学者及知名作家，以哲学小说《苏菲的世界》（*Sofies verden*）闻名于世；贾德在该作品伊始提出两个重大的问题：“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Who are you? Where does the world come from?）参阅：[挪]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萧宝森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如果不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不把能源安全研究的发展历史厘清，那这项研究还是否能够找准自身的定位，确定合理的视角，采用合适的工具，以及做出合乎事实的判断。换个角度说，如果不翔实了解并接受这些业已存在的知识，那么能源安全研究在未来的发展将无从谈起，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从头（de novo）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①

近年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国内学术机构邀请美国一些从事能源安全研究的知名学者前来讲学或参会交流，这种向优秀先行者学习的心态当然是一种值得支持的态度和作为，但是这种“点对点”的互动并不可以完全取代对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发展史的完整与全面的考察，其原因在于：首先，“点对点”的沟通与学习多数仍然是针对具体问题所展开的，达不到全面了解与掌握的效果；其次，如果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想要走向新阶段，毫无疑问需要中国学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真正实现独立与创造，而不能仅仅停留于具体问题分析的层面，这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基础能力养成，唯一可能的获得途径，就是对前人成果进行历史学层面的研习。

随着现代化的加速，中国所面临的能源保障困境与能源安全问题会愈发严峻，能源安全与保障问题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越是重大的现实问题，越是需要严肃的学术研究作为决策的支持力量，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并不会随心所欲地出现，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基础性研究作为所有具体研究的基础。尽管对历史的回顾与审视也许无法对现实中具体的能源安全难题提供直接的答案，但是这种间接的裨益

^①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36.

却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正如前文所说，没有对能源安全研究学术发展史的扎实研习，中国的能源安全研究人员就无法从中汲取到足够的养分，无法真正习得从事能源安全研究所需的理念、视角与方法——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的能源安全保障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0.2 研究内容：概念与议题

0.2.1 概念与界定：什么是“能源安全”与“能源安全研究”

尽管研究者们常常强调定义准确是研究的全部前提，但事实上想要厘清能源安全的定义，绝非易事。菲利克斯·休达（Felix Ciuta）指出，2007年美国施行的《粮食与能源安全法》（*Food and Energy Security Act of 2007*）与《能源独立与安全法》（*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都是重要的有关能源安全问题的法律文本，然而它们都没有对究竟什么是“能源安全”做出回答；^①事实上，根据菲利克斯的研究，美国绝大多数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政府文件都没有明确规范“能源安全”的定义。^②

笔者并非要继承它们的做法，拒绝为“能源安全”赋予准确的定义；但这一小插曲至少告诉我们，能源安全作为一项综合性质的研究议题，对它的定义工作绝非易事。没有准确定义前提，立法部门可以对此

① Felix Ciuta, “Conceptual Notes on Energy Security: Total or Banal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 41, No. 2 (2010): 127, accessed April 17, 2014, <http://sdi.sagepub.com/content/41/2/123>.

② Ibid., 127.

含混其词,但研究却难以进行,政策与学术界无法回避“能源安全”定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然而这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却迎来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总体而言,可以按照各自所强调的内容,将它们划分为三类:甲类,强调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层面的安全(Military Security);乙类,强调供应(Supply)、可承担性(Affordability)与可获得性(Availability)等经济性质因素;丙类,综合概念形式,既涵盖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及国家安全等传统要素,也注重能源效率(Efficiency)、环境保护影响(Environmental Effect)等科技与环境性因素。

就第一类而言,在能源安全的概念与定义中强调军事安全与国家生存要素的组织主要是军事性质的政府部门及其下属研究机构。美国国防部(US Department of Defense)强调国家安全要素在“能源安全”定义中的权重,“当能源、电力供应与分配系统因自然、意外或国际事件因素而出现中断时,有能力避免中断所造成的严重影响”^①,其中美国陆军(US Army)下属的研究部门在《美国陆军能源安全贯彻战略》(*Army Energy Security Implementation Strategy*)中认为“能源安全”代表一种纵贯能源生产系统与能源消费终端的状态,包含可保证性(Surety)、耐打击性(Survivability)、供应力(Supply)、充沛性(Sufficiency)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五个特征。^②

① Drezel Kleber,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Valuing Energy Security”, *Journal of Energy Security*, June 2009 Issue, accessed April 20, 2014, http://ensec.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6:the-us-department-of-defense-valuing-energy-security&catid=96:content&Itemid=345.

② US Army, The Army Senior Energy Council and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for Energy and Partnerships, *Army Energy Security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January 13, 2009, 1.

就第二类而言,数十年来全球化潮流在整个国际社会发挥巨大动能,国际社会的经济与商品化程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态势,因此基于财政、金融等经济学视角去定义能源安全的做法,也已经成为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和机构的首要选择。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认为“能源安全”意指“对全体消费者而言,能源产品在市场以合理的价格和不断的方式进行供应”。^①丹尼尔·耶尔金(Daniel Yergin)认为“能源安全”在发达国家通常指“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取充足的能源”,^②不过在新时期则需要再考虑全球化与整体供应链保护两个维度的问题。^③

第三类概念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它综合性地涵盖了各类与能源相关的因素;不过,这些概念本身也有一定的差别。首先,它们所涵盖的要素点不尽相同;其次,它们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也相互区别——有些强调经济与市场要素,有些则更注重环境保护问题,不一而足。2004年,时任美国国会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主席的彼特·多梅尼西(Peter Domenici)代表本机构提出美国能源安全的目标是“在未来,能源以充沛、可靠、价格合适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同时对环境影响较小;而且不需要仰赖那些敌视美国的能源生产国的一时善意”。^④

① Commissie Van De Europese Gemeenschappen, *Groenboek Op weg naar een Europese strategie voor een continue energievoorziening*, COM(2000)769 final, Brussel: EU, 2000, 11, accessed April 20, 2014,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00DC0769>.

②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 - Apr., 2006): 70-1, accessed April 20, 2014,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31912>.

③ Ibid., 76-77.

④ John Kessels, Stefan Bakker and Bas Wetzelaer,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Role of Coal*, London: IEA Clean Coal Centre, 2008, 7.

本杰明·萨瓦库尔 (Benjamin K. Sovacool) 提供的定义则为“技术上的可行性 (Technical Feasibility)、可承担性 (Affordability)、重视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可靠性 (Reliability) 与供应的安全性 (Security of Supply)”^①。安德瑞尔斯·科姆勒 (Andreas Kemmler) 与丹尼尔·斯普恩格 (Daniel Spreng) 认为“能源安全”的定义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现状而有所区别,前者主要强调“可持续性”与环境保护问题,^②后者则更加复杂,它不仅涉及环境与经济议题,还牵涉到贫苦与公平等社会问题,其内容包括“推进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降低能源强度 (Energy Intensity)、保护自然环境、减低污染,并且向需要能源的全体人群进行分配以提升生活水准”^③。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倾向于第三类定义,将“能源安全”的定义予以极大程度的拓宽,认为它是一整套综合性的概念集合,它以能源与国际政治实体为主要观察对象,以安全为落脚点,其主要内容包括:以能源作为关键动能因素,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科技、环境保护等不同层面对国际政治实体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具体来说,这个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能源问题是个范围极广的领域,既有自然科学性质的问题,譬如物理、化学与工程学,也有人文与社会科学性质的,我们需要过滤的不仅包括前半部分,

① Benjamin K. Sovacool, "Coal and Nuclear Technologies: Creating a False Dichotomy for American Energy Policy," *Policy Sciences*, Volume 40, Issue 24 (June 2007): 102, accessed April 21, 2014, DOI:10.1007/s11077-007-9038-7.

② Andreas Kemmler and Daniel Spreng, "Energy Indicators for Tracking Sustain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Energy Policy*, Volume 35, Issue 4 (April 2007): 2466, accessed April 21, 2014, <http://dx.doi.org/10.1016/j.enpol.2006.09.006>.

③ Ibid., 2471-2472.

也包括后半部分的某些成分，能源安全所关注的是国际政治大背景下能源与国际政治实体，特别是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任何脱离了国际关系要素的能源问题都不属于“能源安全”的范畴。其次，全球化时代中，对国际关系实体而言，安全的定义是高度泛化的，它已经不同于只关注国家生存问题的传统安全概念，^①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承受压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内部发展公平与正义、国家间矛盾与冲突、整体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否、国际市场的平稳程度，这些可能影响国际关系实体及其成员生存与发展的问題，一旦与能源问题发生联系与互动，就都被自动纳入了“能源安全”的议题范畴。再次，能源安全是一个结构

① 根据米利亚姆·凯文迪 (Myriam Dunn Cavelty) 与维克托·莫尔 (Victor Mauer) 的观点，当前在国际关系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 领域中，研究者们所面临的最重要冲突之一就是“传统主义者” (Traditionalists) 与“拓展—深化主义者” (Wideners—Deepeners) 之间的矛盾。前者坚持认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局限于“威胁、军事力量的使用与控制”，后者则强调除去传统的军事威胁研究外，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的风险都应该被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笔者在这里，更倾向于支持后者的观点，在全球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对国际社会而言，安全的内涵与外延都出现了极大的深化与扩展，安全事务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诸如环境气候变化、难民、跨国组织犯罪等新的现象与因素同样可以对国际政治实体产生严重的安全威胁，安全所涉及的主义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无国籍难民、跨国区域组织等新实体形式同样是国际安全的参与者和受影响对象。有关的观点及争论，可以参阅：Myriam Dunn Cavelty and Victor Mauer,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J. Peter Burgess,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New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Jun., 1991): 211-239; John Chipman,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Beyond even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ume 34, Issue 1 (1992): 109-131;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82-93; Jessica Tuchman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32 (Spring, 1989): 162-177;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L. Rienner, 1991);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rthur H. Westing, “The Environmental Component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 vol. 20 no. 2 (April 1989): 129-134.